

參閱文稿

北京華研有限公司
(香港) 桑尼研究公司

No. 2015~27

2015年11月5日

一个实际行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 ——记农村改革起始前后

邓英淘 遗稿

王梅按语：此文是2011年英淘生病期间撰写《发展组六七事》中的一段，并三个附录。文章的题目是我将原文中一个小标题变之而成。文中写的当年事情，我均听他先后提过。英淘生前，有些问题也在反思，所以他并没有要求我发表，《发展组六七事》也没有写完。英淘病中，我曾不止一次说如果需要，你口述亦可，但他总是不置可否，可见他对此事文字的重视。如今，英淘老家要出一个纪念他父亲的文集，征稿再三，我整理出这一篇，也算英淘对父亲的纪念和哀思吧！相信他们在另一世界中已经相会，也会同意的。

在党内，“包产到户”（后来称之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个争

论多年的问题，最早是困难时期安徽提出来的。1961年，在安徽十分艰难的情况下，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曾希圣，在全省范围内有领导、有计划地推行了“责任田”，当年普遍获得丰收，城乡人民生活大为改善，农村再现勃勃生机。虽然这一举措，中央有不少同志坚决反对，但陈云同志表示，何必那么急急忙忙的反对，让他试验几年再看好不好。1962年，邓子恢同志派人调查，凡是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都比没有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收成多。自留地最好，包产到户的地次之，不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最差。……中国农村生产资料中，土地占有最重要的地位，保持了土地公有制，在这个基础上搞包产到户，就找到了适合生产力性质的方式，受到农民欢迎又能促进农业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得到巩固和完善的经营管理形式。遗憾的是，后来在这个问题上，这一新生事物被指责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而被强令改正，党内这部分支持的同志均遭到了严厉的批判，甚至革职等处罚。

1978年底，安徽小岗村18户农民再次搞起了“大包干”，尽管这种实践又展示了其届时的生命力，但其能否正式揭开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仍需有一系列事件的促成。毕竟往事之鉴，使得不少人心有余悸（包括杜润生等中央领导同志）。

一、转发郭崇毅的调查报告

1979年6月18日，陈云出席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会议休息时，万里（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到大会主席团对陈云说：安徽一些农村已经搞起包产到户，怎么办？陈云答复：“我举双手赞成”。稍后万里又就这个问题同邓小平谈了，邓小平答复：“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就行了，就实事求是地干下去”。此后，包产到户在安徽逐步加速推广开来。

同年9月，11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对1978年12月11届三中全会制定的上述《决定》的草案做了修改：把“不许包产到户”的规定改成了“不要包产到户”；《决定》允许“……某些副业的特殊需要、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可以例外，即可以包产到户。

同年10月前后，安徽省参事室参事郭崇毅带着一份关于安徽肥西县包产到户的调查报告来到北京。他在1979年5、6月回老家肥西县，该县在1978年秋冬至1979年夏初遭受百年不遇的大旱，在他的想像中，以往遇到这种情况，农村将会出现严重的灾荒，很多人会外出逃荒要饭。但他所到之处，发现凡是搞了包产到户、到组的社队，却是夏粮获得了大丰收。在这些地方，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例如农民用手把因干旱板结成硬块的土地一点一点地揉成碎末。而在那些没有搞包产到户、到组的地方，几乎无例外地大幅度减产。

郭崇毅把自己回乡的所见所闻写成了一份调查报告，名为〈关于肥西县夏季大丰收情况的报告〉（见附录一），带着它来到了北京。他找了一些部门和单位，希望他们能把这份报告反映给上边，但没有人愿意代转。因为当时中央关于农业发展的精神还是不要搞包产到户。

后来，郭崇毅找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该所的所领导让某个研究室的负责人接待了他，谈完之后，又把郭崇毅推给了陈一谔，并说这份报告的意见正是你所主张和关心的。陈一谔与郭崇毅谈得非常拢，之后陈说：“你把这份报告交给我，我来想办法向上面反映。”

当天，陈一谔拿着这份调查报告到了邓力群家里，把有关情况做了汇报，并转交了调查报告。

邓力群当时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主任，看完这份报告后，经与副主任梅行商量之后，即以书记处研究室白头阅件的形式全文印出并转

发，印发的范围很小，约 30 多份，主要是在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的范围里（时间约在 1979 年的 11、12 月）。

二、见微知著，因势利导（邓小平谈话）

邓小平看到了书记处研究室转发的郭崇毅这份调查报告，很快做出了反应。

1980 年 4 月 2 日，邓小平同胡耀邦、万里、姚依林、邓力群谈长期规划问题，在谈到农业问题时说：“对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贫困的地区，像贵州、云南、甘肃等省份中的这类地区，我赞成政策要放宽，使他们真正做到因地制宜、发展自己的特点。……有的可以包给组，有的可以包给个人，这个不用怕。”

同年 5 月 31 日，邓小平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指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也还是生产队。”

一年前，邓、陈支持个别地方的领导在包产到户方面进行积极地尝试和探索；一年后，更大范围的效果显现出来，情况进一步明了，邓小平向中央的其他领导和相关的中央综合部分的负责同志，对包产到户予以充分肯定，这是中央关于农村政策重大调整的信号。

由此，同年 9 月 14 日，中共中央召开省市区委第一书记会议，着重讨论加强和完善农村生产责任制问题。9 月 27 日，中央印发了这次会议的纪要。纪要指出，自 11 届三中全会以来，各地建立了各种形式

的农村生产责任制，有效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村形势越来越好，……要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不同形式；……在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实行包产到户是解决温饱问题的一种必要措施，没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

这就是 1980 年的中央 75 号文件，在包产到户的问题上，它比前述《决定》前进了一大步。

邓小平与胡乔木、邓力群的这次谈话，后来被整理成一篇文章，题为〈关于农村政策问题〉（见附录二），这篇谈话为整个农村政策指明了方向。

三、安徽农村调查

邓小平与胡耀邦、万里、姚依林、邓力群特别是与胡乔木、邓力群的谈话，是当时党中央的领导人第一次在较大范围内明确表示支持包产到户，这个态度很快就为社科研究领域的不少人所知，使赞成包产到户的人们受到了鼓励和支持。

或许是受到郭崇毅调查报告的启示，陈一谔于 1980 年 4 月 15 日至 7 月 15 日到安徽对包产到户作了为期近一百天的调查，跑了四个地区、14 个县，调查了上百个生产大队和生产队。期间为搞清楚哪种责任制形式最好，他在调查中做了几种比较，如用安徽省实行包产到户面积最大的与实行包产到户较小的区作比较，用整个安徽省的粮食增长、农民收入的增长和全国进行比较，用安徽省不同区域的增长作比较，然后还把一个县、一个公社、一个大队、一个生产队分成不同的责任制形式，将农民收入增幅作比较；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包产到户的效益最高。

另外，陈一谔当时还对若干生产队里的不同户类型做了分类，如劳动力多少，家中是否有干部和工人，对这些不同户类型收入水平做了比

较,最后证明所有人的收入都增加了,只不过劳力多的户收入增加更快。这就反驳了那种认识——实行包产到户会穷的穷、富的富,两极分化明显。

当时安徽宣城县水阳公社有个富裕的生产队也实行了包产到户,效果也很好,这表明包产到户不仅可以在落后地区搞,也可以在富裕地区搞。(一直到1982年的时候,计委还有人指责陈一谔说:你们欺骗了八亿农民,欺骗了中央,包产到户是破坏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

从安徽调查回来后,陈一谔给邓力群做了一次汇报,汇报持续了五个多小时,得到了肯定和支持。后经邓力群介绍,他在北京做了几次报告,如在红塔礼堂向计委、全国农经学会等单位,介绍了包产到户的效果,提出自己对包产到户的看法:这种责任制的效果之所以出人意料,是因为:第一,解决了生产经营的自主权,第二,解决了吃大锅饭的问题;第三,解决农村干部在收入分配上的特殊化问题。

1980年秋,陈一谔总结了这次调查,写了一篇综合报告《农村的曙光——中国的希望》,他提出包产到户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农民的积极性真正调动起来了,中国农业将有一个巨大的发展。

同年7月杨勋撰写了〈论包产到户〉,8~10月陆学艺、王小强对甘肃省包产到户的问题进行了调研。

四、两代同心,其利断金

1981年春节期间(约2月上旬),在北京大学招待所召开了发展组的正式成立会议。会议开了两天,到会的不仅是发展组的正式成员和联络员,还有不少与发展组有关系的人员,前后来的人约有四、五十人。

此次会议请到了邓力群(时任书记处研究室主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和杜润生(时任国家农委副主任)到会做报告。两天的会议,上午

听邓、杜二老的报告，下午自由讨论。

当时，发展组并不是一个正式的组织，而是一个成员多为青年学生的自发民间组织，而邓力群作为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到会讲话，对发展组前一段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对其下一阶段工作提出了希望和要求。这种态势即使在当时的条件下也是绝无仅有的，因而也引起了不少的议论。

邓力群为什么会这样做？其中固然有他对王耕今、杨勋、陈一谔、邓英淘、罗小鹏、王飞欣、孟繁华、孙方明、吴琰、王小强、张木生等人的不同程度的直接、间接了解和认识，但更为重要的是：当时正处于一个政策的大调整时期，国家非常需要这样一支调研队伍。这从他的讲话中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他说：“在座的同志中相当多的都插过队，现在进了城，还能想到农村，这是很令人高兴的事情。中国的十亿人口中有八亿农民，这是我们的基本国情。这好像是一个常识，但是对此真正认识清楚，并由此出发看问题、想问题的人实在还不很多。……你们就是这不是很多人中间的一部分，我们的事业非常需要大批这样的人。”

我对农村有所了解，也有感情，听到大家愿意做农村工作，就感到和自己心心相印。……希望你们能够坚持下去，而且我相信你们是能够做到的，不了解农村就不了解中国，农村的事没有办好，中国的事就不能说是办好的。……一个中国人如果眼里没有八亿农民，就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认识缺陷。就青年人来说，有的在农村，但是想方设法要挤到城市里；有的在城市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他们瞧不起农民，眼里、心里都没有我们的八亿农民。而你们眼里、心里是有八亿农民的。尽管你们现在是小人物，但是你们愿意把自己的真正能力全部贡献给八亿农民，那就代表了中国前进的方向，那么这样的精神生活是高尚的。

现在有人很喜欢讲两代人之间的“鸿沟”。我看，两代人在对事物的认识上当然会有区别。但要真正说“鸿沟”的话，应当是指具有不同思想倾向和社会立场的人们之间的鸿沟。……我们同你们也是两代人，但是，恰恰在这样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上，我们没有鸿沟，而且心心相印。正因为立足于共同的事业，所以才会有感情的交融。

关于包产到户，这是争论多年的问题，最早是困难时期安徽提出来的，有些同志坚决反对。陈云同志表示，何必那么急急忙忙的反对，让他试验几年再看好不好。现在看来，陈云同志这个意见是正确的。1962年，邓子恢同志派人调查，凡是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都比没有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收成多。自留地最好，包产到户的地次之，不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最差。……中国农村生产资料中，土地占有最重要的地位，保持了土地公有制，在这个基础上搞包产到户，就找到了适合生产力性质的方式，受到农民欢迎又能促进农业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得到巩固和完善的经营管理形式。耀邦同志最近讲：我们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正确的，从土地私有制到公有制是一个很深刻很伟大的变革，否定八亿农民具有历史意义的革命形式，说得客气点是无知，说的挖苦点是完全看不到八亿农民的行动、思想、觉悟。……还要看到，包产到户以后，出现了新的生产联合、专业分工。……你们出去调查，在这方面都会增长很多见识。……关于包产到户，一条：这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经营管理方面的创造；另一条：它促进新的专业划分和联合。从事实出发，把这两条讲清楚，就可以说服更多的人。

……

你们提出，要使自己的工作服务于八亿农民，服务于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这个想法很好。你们拟定的题目和准备采取的步骤，我也赞成。

……

要多到一些地方，普遍而深入地了解农民的生活、习惯、思想、感情、愿望。不要以为农民落后就没有创造，不要以为农民穷就安于穷。……要坚定地相信，富有生命力的东西，永远来自于人民，农民问题方面的富有生命力的东西，必然来自于八亿农民。……要把他们的东西加以总结提高，这里头就有我们的用武之地。要勤勤恳恳地把八亿农民创造的东西记录下来，然后加以整理，加以提高。

归根到底，你们是有希望的。……你们中间会出现一批全心全意为八亿农民服务的农业科学家、农村经济学家。……像你们这股劲干下去，十年就可以成为有学问的人。

面对这些来自农村、熟悉农村、考上大学后还想着农村、自愿为农村发展贡献力量的一批中青年，邓力群的一席话可谓“推赤心于诸君腹内，寄厚望于后来居上。”（见附录三）

对此，杜润生的谈话也表达了相同的态度和立场，他说道：

农民不富，中国不会富；农民受苦，中国就受苦；农民还是古
代化，中国就不会现代化！农民定，天下定。……我们是靠农民起
家的，决不会让农民经受资本主义分化的痛苦，必须找到一条使农
民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

一方面要办好事，一方面要避免把好事办成坏事。这就要有科
学的研究、科学的决策，就能避免损失，少花代价，这就是你们研
究工作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因此我这个支持决不是客气话，而是
出于对事业利益的考虑。这是我们事业的需要，是人民的需要！中国
的农民真是太好了，从民主革命开始，他们就万众一心支持共产党。

……

许多同志下过乡，和农民有阶级感情，阶级感情是我们办好一切事情的基础，它激励我们去发现真理。同志们，八亿农民期待着你们！

五、滁县大调查

1981年2月发展组正式成立会议以后，由王耕今、陈一谔力荐张木生（时在内蒙农村），经邓力群亲自批准，于3月份前后，将其由内蒙牧区直接调回北京，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工作，与陈一谔在同一研究室（人民公社研究室）。此时在农经所里，陈一谔算是有了一个助手。张木生调到农经所不久，既由陈一谔安排到安徽滁县农村蹲点、印书。

但约在1981年6月，在何维凌的岳母家，陈一谔召集何维凌、邓英淘、王小强开会。会上，陈一谔提出要求邓力群予以帮助解决正式编制的问题，如若非此，他就不再承担全组的协调工作，谁愿意干，谁干好了。此言一出，谁也没想到！与会其他同志均认为发展组成立仅三个月余，发展势头正旺，大家干劲十足，很不容易，无论如何要坚持下去。但在当时，陈一谔摆出一幅要撂挑子的架势，其他三人坚决反对，而当时又没有人能在发展组替代他的角色，于是双方相持不下。

过些天后，陈一谔、何维凌、王小强等就此问题继续开会，这时张木生从安徽滁县蹲点、印书归来，也参加了会议。大家把情况摆了摆，他也不同意陈一谔的看法，接着他提出一个建议：近来滁县地区涌现出很多包产到户的不同形式，以及实行包产到户后一些新苗头，很值得关注；是否把成立正式机构与发展组的集散问题搁置一下，适当集中力量到滁县地区做一次有关包产到户的综合调查。这个建议立即得到了何

维凌、王小强、邓英淘的支持，陈一谔也表示同意先搞完这次调查，其他问题以后再说。

张木生提出的建议，使会议的议题转到了如何组织好这次调查。由于发展组的多数成员都为 60 年代末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而后又在高考恢复后陆续考上了大学（绝大多数是 77、78 级），平常不可能有集中的时间下乡调查，只有暑假才能抽出时间来做这项工作。

这样，陈一谔、何维凌、王小强、邓英淘等开会决定，在 1981 年 7-8 月组织发展组的基本力量，事先搞好调研设计，并分成若干个专题调研组和典型调研组，围绕“双包到户”这一中心，对安徽滁县地区进行一次深入而系统的调研。为了在调查中不产生重大遗漏，整个调研的策划和设计方案还向邓力群作了汇报，并得到他的意见和肯定。

为此，几乎集中了发展组第一、第二批成员中绝大多数骨干，大约近 30 人：陈一谔、杨勋、王小强、邓英淘、白若冰、张木生、白南生、白南风、周其仁、杜鹰、谢扬、李谊青……。

从 7 月中旬开始至 8 月下旬，历时 40 多天，进行了十几项专题调查和典型调查，范围涉及整个滁县地区的八个县、市。整个调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全体调查人员先在地区听取地委、行署及地区十几个部门的综合情况和专门情况的介绍和汇报；在这个基础上，各专题和典型调查小组修订了在北京拟好的调查提纲，并对有些课题设计和分工做了适当的调整，以及征求地方同志对调研方案的意见。

第二阶段，按照新的经过修订的调研提纲和分工，各小组分头到有关县、乡、村及相关部门进行专题调查和典型调查，其中有些调查小组还和地方的同志进行了混编。在这个阶段，杜润生和王耕今还到滁县对调查人员进行看望和指导。

第三阶段，各调研小组收集好相关资料后，又集中到地区，进行交

流和讨论，补充资料，形成写作提纲。有的小组在滁县就完成相应调查报告初稿的写作，并向当地的相关干部和领导征求修改意见；有的小组则是在返回北京后完成了调查报告的撰写。

这次调查进行得相当深入，所有参与调查的人员的工作也非常辛苦。当时，滁县地区正值五、六十年不遇的高温，很多人在招待所里都是脱光膀子看材料、写东西，有的同志甚至坐在放满水的浴缸里看写材料，可见其工作热情和工作状态。另外，很多县、乡几十年没人看的、压箱底的材料，都被翻了个底朝天，一些五、六十年代的材料，纸张已经黄潮不堪，也被翻腾出来；为了不产生重大遗漏，但凡有点用的材料，全被调查组收集起来，当时有些调查组成麻袋的往回背材料。有的调查人员为了搞清楚一个案例，还住到了老百姓家里。这种方式当然和滁县地委和政府的全力支持是分不开的，他们说多少年都没见过有这么搞调研的了。为了搞好这次调研，地委和行署还给每个专题调查组配备了一至两名当地干部，帮助安排食宿、接洽工作关系；因此，参与这次调查的人员大约有 40 多人。

调查后，各小组分头形成了十几份专题报告和案例研究。专题调查报告篇目如下：

- 1、“双包到户”后的粮食生产前景问题（邓英淘、张阿妹）
- 2、“双包到户”后农村社会贫富问题（白南风、邓永恩）
- 3、“双包到户”后的劳动力和资金变动趋势（白南生、徐宽、赵明宇）
- 4、“双包到户”后的协作与联合问题（张木生、杜鹰、谢扬）
- 5、“双包到户”后农村基层单位经济职能的变化和公社体制改革（周其仁、王小强）
- 6、怎样看包干到户（杨勋、孙方明）

典型调查报告篇目如下：

1、巨大的变化，深刻的启示 — 安徽凤阳县小岗、雁塘头生产队包干到户的典型调查（陈锡文、马苏元）

2、先进队为什么也搞起了包产到户 — 安徽省全椒县老观陈大队包产到户的典型调查（杨冠三）

3、从“炮打不散”到包产到户 — 安徽省来安县大余郢生产队生产组织形式演变的典型调查（梁小东）

当时，还有两份调查报告未公开印出。一份是：典型调查报告〈这个大队为什么没有实行包产到户〉，这是陈一谔特别指派邓英淘做的蹲点调查（似乎是凤阳县梅市公社的一个大队），为得是进行对照比较。

另外一个杨勋做的关于〈农村人口和计划生育〉的专题调查报告。这个报告对后来中央的人口决策产生了较大影响，它停止了试图在农村强制推行一胎化的极其错误的做法，明确规定每对农村夫妇生两个孩子是合法的；从而避免了今后我国人口出现自由落体的危险性。

课题组的大部分成员在8月底返回了北京。在这些专题研究和案例研究的基础上，由陈一谔带着孙方明同志执笔，参加协作的还有：王小强、邓英淘、白南生、张木生、白南风、周其仁。用了大约一个多月的时间，经数次集体讨论和修改，于1981年10月完成近三万字的《“双包到户”地区农村发展的问题和趋势》综合报告。

平心而论，应该说这次系统调查、综合报告及相应的专题、典型调查报告，对当时人们最为关心和争论最多、最大的双包到户相关问题及走势，做出了当时条件和认识下的最全面和最好的回答。

六、赵的批示和第一个“一号文件”

上述综合报告完成以后，陈一谔立即将其面呈邓力群，邓力群看后，

认为很重要、很及时（1981年的10月，当时国家农委正准备起草中央的第一个“一号文件”），于1981年11月上旬前后将其送交赵紫阳。赵紫阳看后，作出了如下批示：这个报告把包产到户的来龙去脉讲得一清二楚，建议政治局的同志都看一看。

当时党内的一枝笔胡乔木看后亦很称赞，胡耀邦也说：这是经得起检验的东西。那么，赵紫阳为什么对这个报告有如此好的评价？除了其对当时最关注、争议最多最大的双包到户的相关问题及走势，给出了当时条件和认识水平下的较好回答，还有一个更为直接的原因，即它帮助有关的中央领导下了最后的决心，即不再给三种地区（困难地区、中间地区、先进地区）各选一种主导的责任制形式（见本节附录），而是只要当地群众愿意，各类地区皆可以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为主导责任制形式，不必再有其他约束。如此，第一个中央“一号文件”的基调便贯之以一了。

1981年冬，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会后不久，国务院领导（赵紫阳）到东北考察，写回一封信，建议“不要再强调地区不同形式了，让群众自愿选择，选上啥就算啥，领导不要强堵了。”¹

于是，国家农委就根据这个精神起草了198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即《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正式肯定了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结束了包产到户30年的争论，从此成为中央的决策。广大群众、干部对此反映良好。²

¹ 《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人民出版社2005年。

² 《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

附录一：

关于肥西县夏季大丰收情况的报告

郭崇毅³

一、空前未有的粮食增产

我在县里时候，听说肥西有两大突出，一是夏季粮食成倍地增产；二是生产责任制包产到户的多。到了区里，情况就更具体。官亭区过去夏季最高的年产量（1977年）只收麦669万斤，而今年据区里估计，在二千万斤以上，超产两倍。山南区1977年夏季收麦579万斤，今年估产在二千多万斤，比最高年产量增产近三倍。为了证实这奇迹般的丰收数字，我深入到社队走访调查，发现官亭公社历年麦收都在90几万斤，今年公社估计要收250万斤以上，金牛公社过去最高年产量未超过80万斤，今年则收麦260万斤，增产都是两倍上下。再到生产队，奇迹更光彩夺目地展现出来了。我走进官亭公社官北大队夏老庄生产队几个村子，一眼望去，场上到处都是麦堆，家家屋内都有一大堆麦子。其麦秆之粗，麦穗之大，就像我前年到涡阳参观，看到亩产六百斤的丰产田麦子一样。队长袁友和告诉我：“去年这个队只收麦一万五千斤，今年麦收前估计能收四万一千斤，但实际收了将近五万斤。”翻了两番多。以户为例，他家去年只分到麦子614斤，今年却收了大、小麦2500斤，按照定产，只缴生产队650斤，但还能拿回350斤口粮，实际共得粮2200斤，比往年收入增加接近三倍。据袁队长介绍，他家今年的收入，

³ 1979年6月，原载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主编：《包产到户资料选（二）》。

在本队不算“冒尖”，只算“中等”，还有好几户一个人口平均收麦五百斤以上。在我走访途中，一个约 30 岁素不相识的青年社员突然拦住我，他叫方立春，自我介绍他家的收入。据云：他家五口人，去年分到麦四百斤，菜油、棉油二斤一两，去秋他包了四亩地，今年夏季收麦 1500 斤，菜油 106.5 斤。他当着许多人的面，大声疾呼：“我家年年不够吃，要背着口袋出去‘搞粮’，今年一下翻了身。多亏 11 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好政策”。在场的人闻之，亦感受很深。

二、增产的主要原因

大旱以后，适宜麦子的生长，这是今夏丰收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所以成倍的增长，则一致认为包产到户这一措施调动了广大社员的积极性。山南区委汤书记介绍，去秋如不责任包到户，最多只能收 1200~1300 斤麦，要少收近一半。夏老庄生产队袁队长说：去年秋种，如果不包到户，包到组我们也要增产，但最多只能收二万斤，要少收近三万斤。关于责任到户可以大幅度增产，连坚决不愿意这样做的队也承认这个客观事实。如官亭公社官亭大队南郢生产队长何义安说：“我们大队 15 个生产队，就我这一个生产队分成两个组，没有分到户。有许多社员对我和崔会计有意见。我在上个月已经自动检讨了，因为我队比分到户的邻队，夏季要少收几千斤。”这个队在公社大门口，只有 67 亩地，队很小，竟然少收几千斤，这是惊人的。当何队长介绍情况时，公社有两个委员在场，他们听了一致认为，“少收几千斤不止，总要少收一万斤！”这就明显看出包产到户与到组，仍然是有区别的。

为什么责任到户就成倍地多收？经大家共同探讨得出结论是：因为它解决了三个问题。

1、播种面积扩大了。以山南区为例，区委汤书记说：“去秋县里

给我区四万六千亩秋种任务，我们在大旱之年，想多种些‘保命麦’。就咬牙安排了4.8万亩，但因土地龟裂，种不下去，到9月15日才种一千多亩。这在六安地区七个县是落后的。以后省委来人，我们提出‘三定一奖’包到户种的办法，10月3日安排下去，群众非常拥护。到10月10日，就种了5.9万亩，区委看到社员积极性发动起来了，接着号召向十万亩进军（其中有两万亩是借给群众，谁种谁收），就这样，到11月底，种了十多亩麦，二万二千亩油菜，2.74万亩红花草，全区消灭了空白田。”山南区过去每年都有三、四万亩冬闲田，大旱之年，反而能全部播种，实是奇迹奇闻！据反映，去年种麦时，许多农户点着煤油灯，在地里一连奋战三、四个昼夜，犁不动的地和牛力不足的地方，就用大锹挖地。金牛公社郭副书记说：“我社去秋种麦，有八千亩稻板田犁不动，完全是用大锹挖出来的。”

2、肥料增加了。我所到之处，都反映去年秋天种的地肥料多，家家户户不但把屋里屋外的农家肥都铲光扫尽，送到地里，而且差不多每家都买了几十斤甚至几百斤的化学肥料或饼肥。在官亭和山南两区，都有社员到供销社或在路上拦住汽车，抢购化肥之事。至于分到组的队，对购买肥料又是另一种情况。我曾问南郢生产队长买过肥料没有？他说：“没有”。

3、认真耕作、精细管理。1978年分到户的麦田，一般都做到了“耕透耙熟”。连用锹挖、锄头的也都拼命这样做。在麦苗生长困难的地方，有跑几里路挑水浇地的。至于防备牲畜糟蹋庄稼，更是人人处处自发的精心，与在队里或组里的生产态度大不相同。

三、增产后个人、集体与国家的关系

肥西县丰收之后，到处喜气洋洋。责任到户的社员更是兴高采烈。

他们说：“只要让我们干三年，我们要盖瓦屋，国家也有粮食了。”有的人惟恐田地要往回收，说：“国家不放心我们嘛，如果放心我们，让我们干几年，我们国家就民富国强了。”

粮站有位管调度的姓徐的同志估计，今年官亭全区可能要收进麦子一千万斤，而过去历年征购加超购，最多只能收一百万斤。农民购返销粮也少了。据一位管供销社的同志介绍，全区返销粮至5月底到期，还有80万斤没有售出，又延期到6月10日。由此证明，农民有了粮食，国家确实也就有了。

对于五保四属，我了解夏老庄生产队两户无劳力未分田的干属，他们说，队里给他们的口粮不会减少，没有意见。我又问了官亭农具厂一位干部，一位工人，他们家里缺乏劳力，但分了田地，经过算账，都说农忙时请人帮助一些劳力。所花的钱比过去交到队里的钱要少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也很满意。对于五保四属户如何照顾，我曾向包产到户的队问过这个问题，有个社员回答：“只要大家都多收粮食，他们还愁没饭吃？如果大家裹在一起‘绑着穷’，就是我的老太太，我也没法养活她！”

四、社会秩序安定

肥西去年赌风盛行，迷信活动也有抬头趋势。县委的所在地派镇，以及区委所在地官亭、山南两处，都有公开赌博的。搞迷信活动的都在山区附近。但现在已看不到这些现象，农民披星戴月搞生产。集市贸易每天都有猪肉、油炸点心卖。但不论逢集背集，上街的人除了到粮站卖粮食，换钱买肥料、买菜、买肉外，很少有闲人在街上游逛。前几年街上买不到猪肉的，而在农忙季节到街上闲逛的人却不少。当时区委和公社党委一班人，都曾亲自上街劝阻，甚至出动拿红棍子的专政队，到街

上去赶，也无效。现在不但看不到一个闲人，也看不到一个要饭的或外来的流浪汉。交通秩序也好。我从官亭搭上午七时二十分的汽车到上派镇，沿途经过的都是小村镇，上下秩序井然，到站时间往往一分钟都不差，比起“四人帮”横行时，火车都不正点，又是一大奇迹。

我为了了解治安情况，曾走访了官亭派出所所长奚业精。他说：“去年大旱，群众手中无粮，心中着慌。我们以为发案率要增加，心里也慌，但实际上直到今年正月以前，发案率比往年反而低。二月以后，案子逐渐增加，一般都是赌输的人，偷窃还债。”奚所长说：“对赌博问题开始我们管的不严，3月31日，省里张恺帆书记和程光华副主任开了一个会，我们认真一管，问题就解决了。”至于政治案件，奚所长介绍：“1976、1977两年发现一、二起‘反标’，都是小孩搞的，1978年和今年没有发现这类事件。”

五、两种意见

现在基层干部和农民中议论纷纷的是两种意见：一种说，包产只能到组，不能到户。他们认为，到组还是社会主义，到户就是资本主义。这种观点以南郢生产队长何义安及崔会计为代表。崔会计去秋为抵制包产到户种麦，曾与公社街道黄委员吵了一架。崔说：“从合作化到现在，干了20多年，不能走回头路。”何队长这次也向我说：“分到户对现代化有妨碍。大机器不像一把大锹，可以扛着走，把田包到户，将来机械化了，怎么办？”在干部中还有一种顾虑，就是怕包到户后争水争牛力，容易发生纠纷，耕牛和大农具也容易伤亡和损坏。据介绍，山南区确实有累坏三条牛的事。

另一种是主张包产到户的。这种人在干部、群众中都占相当数量。他们说，只要土地是集体的，按国家计划生产、分配，那么包产到户，

也还是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不是资本主义。他们还认为，国家需要粮食，包产到户多收，能多贡献，这才真正是为四个现代化出力。如果在一起“绑着穷”，那才是妨碍四个现代化。他们气愤地反问：现在大机器还未来，为什么现在就要我们吃“大锅饭”？等将来大机器来了，我们再改也不迟！持这种观点的要以夏老庄的队长袁友和社员方立春为代表。他们自称讲话喜欢“捣实”，侃侃而谈，毫不隐瞒。袁在这个队当了11年生产队长，也是大队党支部委员、副主任。他说，包产到户，水利、牛力麻烦是多些，但只要领导依靠群众，注意安排，问题是可以解决的。目前正是这个队放水栽秧的时候，果然他们这里没有“打破头、累死牛”的事发生。

这两种意见发展的趋势如何？南郢生产队长何义安有个估计。他说：“到秋收，如果上级有指示不准分，我们两个组就并到队里。分组生产也有纠纷，不好搞。如果上级允许随便怎么种，只要多收粮食就行，我们还是要分到户。”何义安一再表示：“我不愿分是为了大方向；要想粮食‘陡升’，只有到户。”我曾问过官亭公社杨书记，“你们的一季‘保命麦’已经收到家了，既然怕包到户方向不正确，为什么还不收？”杨说：“现在旱情仍然很严重，栽的又是麦茬秧，我不敢收，收了影响群众的积极性，秋收的稻子就没有着落了。”

六、两个问题

一、有些干部和社员问题：我们包产到户，土地还是集体的，既不能买卖，又不能拿它剥削别人，和工业上计件工资定额到人，性质是一样的，为什么叫资本主义？

二、一些比较负责的社、队干部想不通。他们问：我们搞了20多年农业工作，往往把粮食搞减产，或者徘徊不前，还说大方向正确、路

线正确？而把粮食搞大幅度增产了（1961年、1962年及今年夏季），反而说大方向错了，路线错了，这到底是什么理论？长期搞下去，我们怎么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党，对得起国家？

七、我的几点认识

1、我认为，在百年未遇的大旱情况下，今年夏季肥西县能获得如此大丰收，是党的三中全会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安徽省委的正确农业政策的结果。如果“四人帮”没有打倒，他们不顾群众死活，坚持什么“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山南、官亭两区的夏收是不会像今年这样一跃而翻两三番的。

2、农村干部和社员提出的两个理论问题，带有相当的普遍性。建议有关搞理论工作的部门，及时研究解答，这对指导农业生产健康发展，有迫切需要。

3、肥西县山南、官亭两区，在去年秋种时，大部分土地都已经包产到户。现在大约仍有半数以上社队维持原状。如果允许他们继续搞一些时候，应当指导他们总结经验，订一些管理制度，解决各种具体问题，对这促进生产发展更有好处。现在有不少干部一致公认包产到户可以大量增产，但又不敢帮助生产队和社员总结经验，制定管理办法，这是很大的问题，也是不正常的现象。

附录二：

关于农村政策问题

邓小平⁴

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也还是生产队。这些地方将来会怎么样？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具体说来，要实现以下四个条件：第一，机械化水平提高了（这是说广义的机械化，不限于耕种收割的机械化），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适合当地自然条件和经济情况的、受到人们欢迎的机械化。第二，管理水平提高了，积累了经验，有一些具备相当管理能力的干部。第三，多种经营发展了，并随之而来成立了各种专业组或专业队，从而使农村的商品经济大大发展起来。第四，集体收入增加而且在整个收入中的比重提高了。具备了这四个条件，目前搞包产到户的地方，形式就会有发展变化。这种转变不是自上而下的，不是行政命令的，而是生产发展本身必然提出

⁴ “这是邓小平同志 1980 年 5 月 31 日同中央负责工作人员谈话的一部分。”（《邓小平文选》第 2 卷）

的要求。

有人说，过去搞社会主义改造，速度太快了。我看这个意见不能说一点道理也没有。比如农业合作化，一两年一个高潮，一种组织形式还没有来得及巩固，很快又变了。从初级合作化到普遍办高级社就是如此。如果稳步前进，巩固一段时间再发展，就可能搞得更好一些。1958年大跃进时，高级社还不巩固，又普遍搞人民公社，结果60年代初期不得不退回去，退到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有些地方把原来规模比较合适的生产队，硬分成几个规模很小的生产队。而另一些地方搞并队，又把生产队的规模搞得过大，实践证明这样并不好。

总的说来，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除表现在集体化的组织形式这方面外，还有因地制宜发展生产的问题。所谓因地制宜，就是说那里适宜发展什么就发展什么，不适宜发展的就不要去硬搞。像西北的不少地方，应该下决心以种牧草为主，发展畜牧业。现在有些干部，对于怎样适合本地情况，多搞一些经济收益大、群众实惠的东西，还是考虑不多，仍然是按老框框办事，思想很不解放。所以政策放宽以后，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意愿出发，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在宣传上不要只讲一种办法，要求各地都照着去做。宣传好的典型时，一定要讲清楚他们是在什么条件下，怎么根据自己的情况搞起来，不能把他们说得什么都好，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更不能要求别的地方不顾自己的条件生搬硬套。

附录三：

在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讨论会上的讲话

邓力群⁵

我讲三点意见。

第一，不了解农村就不了解中国

在座的同志中的绝大多数都插过队。插过队，现在进了城，还想到农村，是令人很高兴的事。中国十亿人口，其中有八亿农民，这是我们的基本国情。这好像是个常识，但是对这种国情真正认识清楚，并且由此出发去看问题、想问题的人，实在还不是很多。你们当过农民，现在还想把自己的学识、能力用于农村的发展，拿你们的话来说，就是为了这项事业要有一种献身精神。有了这样的认识，有了这样的觉悟，而且终年累月，切切实实地干下去，证明大家没有辜负党的教育，不愧在这样问题上先进分子。你们就属于我来说是还很不多的人中的一部分。我们的事业非常需要有大批这样的人。

我13岁以前在农村，后来到长沙、北京读书，“12·9”以后到了延安，和农民有点接触。日本投降后，到东北搞了三年半土改。后来到新疆，也在农村呆过一年多时间。1957年、1961年两次到农村做过调查。1964年、1965年又搞过两期“四清”。干校七年，住在农民家。

⁵ 1981年1月5日，原载《农业经济丛刊》1981年第3期，中国发展问题研究组编：《农村·经济·社会》1981年卷。

我对农村有所了解，也有感情，听到有的同志愿意做农村工作，就觉得和自己心心相印。你们决心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奋斗，希望你们能坚持下去，而且相信你们是可以做到的。

不了解农村，就不能说了解中国，农村的事没办好，中国的事就不能说办好了。毛泽东同志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就讲到这个问题。那里头虽然是以工业产值、农业产值来讲这个问题，但实际上也是讲农民问题和工人问题。农民多，生产力落后；工人少，但它代表先进的生产力。这个问题是决定中国革命、以至革命以后相当长时期的一个最基本的出发点，是决定我们的一切战略、策略和一切基本政策的出发点。革命时期是如此，建设时期仍然如此。

毛泽东同志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历史功勋。其中非常突出的一点，就是毛泽东同志领导我们党，确立了这样一条符合中国实际和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即代表工人阶级把中国广大农民团结起来，进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武装革命，由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取得城市，取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接着又把占全国人口 80% 的农民，引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页。

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也犯过错误。这些错误，使我们没有能够取得预期的效果，走了不少弯路。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已经大为提高，而且正在从各方面采取措施，切实有效地纠正和避免发生过去的错误，努力使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些。作为历史教训，它不仅对我们这一代人，而且对你们这一代人以至以后的人们，都是需要记取的。如果我们能使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八亿农民政治上翻身，经济上也翻身，并且越来越好，使农民真正发展成文明的、富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那我们整个国家的面貌就会大为改观。南朝鲜、

香港、新加坡没有八亿农民的问题。日本、西欧、美国、苏联几个国家的农民加在一起，也没有八亿。我们把八亿农民的事情真正搞好了，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都将有伟大的意义。为了这个事业，是值得把全部精力、全部生命贡献出去的、是值得为之牺牲一切的。

一个中国人，眼里没有八亿农民，不能不说是认识上的很大缺陷。就青年人来说，有的在农村，但是想方设法要挤到城市里；有的在城市，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他们瞧不起农民，眼里、心里都没有我们的八亿农民。而你们眼里、心里是有八亿农民的。尽管你们现在是小人物，没有资望，可是只要真正把自己贡献给八亿农民，那就代表了我国先进的力量，代表了中国前进的方向。这样的精神是高尚的、丰富的。

是的，我们的农村贫穷落后。毛泽东同志讲“一穷二白”，实际上主要是指八亿农民经济上贫穷，文化上落后。可是另一方面，每一个在农村生活而又不怀偏见和正视事实的人都会承认，我们的农民勤劳朴实、正直善良，有许多可敬可爱的优秀品质。有个电影片叫做《家乡的红叶》，那里有个情节，生动地反映了中国农民的一种可爱的品质。一个复员军人当了队长，在工作中碰到了障碍。这时接到通知，调他到县武装部工作，他犹豫时，有个女孩子很有志气地对他说：你走就走吧，可是你要想到我们这个地方再穷，也是生你养你的地方，这两句话尽管很普通，我看确实是农民的语言。这个作者很懂得农民。我在干校期间，到西柏坡去参观过。除西柏坡稍微平坦一点，一路都是山区，荒山秃岭，无数块巴掌大小的土地，有的只能种几颗玉米。农民天天上山下山，一块一块地耕耘收获，祖祖辈辈在那种条件下劳动和生活，默默无闻、一点一滴、长年累月地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那里的土地。一天一天，一年一年，一代一代，这本身就是轰轰烈烈的事业。这样的光辉业绩，就是

我们的被一些人看不起的农民干出来的。

看不起农民，眼睛里没有农民，心里没有农民，这是一些人，特别是一些知识分子的不大健康的情绪。他们既然这样看不起农民，农民也有权忘记他们、抛弃他们！历史上常有这种事情：心里记挂着农民的，为农民服务的，农民就想着他；忘记农民的，不为农民服务的，农民就抛弃他。我们的农民，正因为他们是劳动者，所以作为整体来看，他们不会失去判断谁是他们的真正朋友的能力。真正为农民尽力的，为他们的解放事业献身和作出牺牲的，包括知识分子，农民将永远记着他们。

现在有人很喜欢讲两代人的“鸿沟”。我看，两代人之间在对事物的认识上当然会有区别，但是要真正说“鸿沟”的话，实际上应当是指具有不同思想倾向的人们之间的鸿沟。年纪大小在人们之间带来的不同认识，远远不如社会立场在人们之间带来的不同认识那么严重，那么具有根本的性质。我们跟那些想不到农民、鄙视农民的人之间的鸿沟，确实是很深的。可以说，使这个鸿沟填平的唯一办法，就是他们真正同人民站到一起来。我们同你们也是两代人，但是，恰恰在这样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上，我们之间没有鸿沟，而且心心相印。正因为立足于共同事业，所以才会有感情的交融。

第二，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才有农民的发展

要使八亿农民比今天生活得更好，要做的工作很多。但是从大的方面说来，还是必须走他们已经选定的道路——社会主义道路。你们研究中国农民的发展，我想也是社会主义道路下的农村发展问题。离开这个道路来谈农民的发展，是不会有希望的。

我想谈一点过去搞土改时看到的情况。吉林榆树县的土地、房屋大量集中于地主。自己有几亩地的贫农很少，人数最多的是“房无一间、

地无一垅”的雇农，占到农村人口的60~70%。地主占那么多土地、房屋，怎么经营？他出租土地，要看你有没有一套马车犁耙，就是三匹马一张犁。只有这样，才能取得租地的资格。大量的雇农，是连这样的资格也没有的。土改后，贫雇农分到了土地和牲口，可是牲口怎么办？分你一个，我分一个，他分一个。一个牲口怎么种地？只好几户凑个互助组，自愿结合，提出了相互合作的要求。要搞生产就必须互助。后来我又到了新疆。那里大部分农牧区还处在封建社会中期，生产落后，生产关系也落后，但是土改以后农牧民也要求互助合作。所以说，搞合作化，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共产党强加的，而是农民自己的要求，是社会前进、生产发展的客观要求。说合作化搞错的人，相当多的是因为不懂事，没有参加土改，没有参加减租反霸，人云亦云。其中也有老干部。但是老干部中间，也有没做过多少农村工作，没到农民中去较长时间的人。说合作社搞得快了一点，工作搞得粗了一点，这是事实。但因此全盘否定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否定搞合作化，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关于社会主义改造，我们过去的提法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仔细推敲研究一番，就会看出这不太准确。应该说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改造是一个包括多方面的内容，需要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完成的任务。包括解决所有制方面的问题，都是一个需要很长的过程。这个过程要一直延伸到共产主义。按照过去那个提法，好像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基本完成。这样就容易造成急性病，急于过渡嘛。现在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在这个基础上，今后还要继续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要做的工作还很多。

就农村来讲，把土地私有制改造成公有制，意义是非常伟大的。可以设想，如果土改以后，我们不搞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让私有制长

期存在下去，那会怎么样呢？毛泽东同志当时就看到，农村已经发生分化，继续发展下去，分化必然越来越重。中国有一个重要特点，是土地少人口多。土地私有制不改造，不发生分化才怪哩。我们及时地把个体农民的私有制，改造成社会主义公有制，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把土地个人私有变成集体公有，这就避免了分化。这恰恰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成功的经验。在具体步骤上，尽管我们也不是没有错误，但从全国范围看，甚至在林彪、“四人帮”为害甚烈的十年动乱期间，公有制也没有公开大量地退回到私有制去。这个事实本身，难道还不足以说明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农村，有着深厚的基础和巨大的生命力，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由衷的热爱和欢迎吗？这难道是光靠共产党下命令能够做到的吗？

至于包产到户，这是争论多年的问题。最早是困难时期安徽提出来的，有的同志立即坚决反对。陈云同志表示，何必那么急急忙忙地反对，让它实验几年再看好不好？现在来看，陈云同志这个意见是完全正确的。1962年邓子恢同志派人调查，凡是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都比不实行的强得多。自留地最好，包产到户的地次之，不是自留地、又不搞包产到户的地最差。邓子恢同志说，这是合作化以来经营管理方面的一大创造。反对的人说，这不是什么经营管理问题，是方向问题。有的中央领导同志批评得更厉害，说主张分田到户的人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一看就知道他是主张单干的，最危险的是主张包产到户的，名义上在保护合作化，给人觉得他搞得是维护集体化的经营管理，因此带有很大欺骗性。现在越看越清楚，中国农村生产资料中土地占有最重要的地位，保持了土地公有制，在这个基础上搞包产到户，就找到了适合生产力性质、受到农民欢迎、又能促进农业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得到巩固和发展的经营管理方式。在这方面，你们已经专门做了调查，是了解不少情

况的。很清楚，这种包产到户是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包产到户，尽管是大包干，也绝不是分田到户，更不是单干。

耀邦同志最近说，我们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正确的，从土地私有制到公有制，是一个很深刻、很伟大的变革。否定八亿农民的这种具有历史意义的革命行动，说得客气点是无知，说得挖苦点就是完全看不到八亿农民的行动、八亿农民的思想、八亿农民的觉悟。对广大农民的这种深刻的历史要求，必须肯定。想否定是否定不了的，只能说明自己可笑、幼稚、无知。他还说，我们进行了这种改造以后，在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方面，在解决集体经济基础上关于发展生产、组织生产、搞责任制、收益分配等一系列问题上，虽然也不断地摸索，但是长期没有找到合适的办法，而且犯了很多错误。只有到了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才上来路。

现在，在所有制这些问题上，各地农村都有很多新创造。“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这样，我们的集体经济就更加巩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能更好地发挥。有人攻击三中全会的路线和三中全会以来中央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特别是抓住包产到户大做文章。应当承认，在这点上，我们的宣传工作确实有缺点，就是没有讲清楚包产到户是公有制基础上经营管理方面的创造。你讲包产到户这样好、那样好，公有制一字不提，人家当然要讲你是单干嘛。

还要看到，包产到户以后，出现了新的生产联合、专业分工。宋平同志讲，甘肃一向很穷，搞包产到户比较早，搞起来以后，自然地产生了一种生产上进行分工和联合的需要。有个生产队有台电磨，包产到户后，有人提议把电磨卖掉，每家分几个钱。一讨论，多数人不同意卖，电磨留下了。经营管理有了一点改善，挣了一点钱。有人又建议把钱分掉。多数人主张再买一台电磨。增加了电磨，又需要增加几个人。这不

是分化出几个劳动力去搞电磨了吗？挣的钱多了，除了用于扩大再生产部分，也分给社员一些，使家家增加了收入。包产到户以后，羊增加了，各家自己放，很不方便。有人提出干脆把羊凑到一起，搞个劳动力专门放羊。这样，不是又有劳动力去干这件事了吗？地也可以由几个主要劳动力带着各家的辅助劳力种起来，其他人搞点别的副业。这说明，实行包产到户后，由于分工的要求、专业化的要求，各种新形式的联合开始产生了。去年，吴象同志到几个原先很穷的地方，也看到这种情况。你们出去调查，在这方面都会增长很多见识。包产到户存在多种多样的形式，它是不会停滞、凝固的。生产积极性发挥出来之后，生产发展之后，专业化分工和联合是必然要提出来的要求。

关于包产到户，一条，这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经营管理方面的创造；另一条，它促进新的专业化分工和联合。从事实出发，把这两条讲清楚，就可以说服更多的人，打消怀疑者的顾虑，驳倒别有用心的人的攻击。同时，也只有不断地总结经验，深化我们的认识，才能使党的政策进一步贯彻下去，真正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这是只就包产到户一种经营管理方式而言。

现在全国各地农村，在专业化分工、联产奖励、联产到劳等方面，形式是很多的。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我们搞社会主义改造的方向没有错，坚持社会主义的道理不会错。决不能在这个问题上有丝毫动摇。当然，极个别地区，十里、八里才有一户人家，硬让人家联也联不起来，勉强去联，实在劳民伤财，农民不欢迎，生产也受妨碍。这类个别地方，中央的政策允许单干。它数量很小，不会影响我们社会的性质，不会影响我们的根本方向。研究农村问题、农业发展问题，一定要坚持这样一个根本立场。在这个问题上，必须站稳脚跟，明确方向，然后稳步。

第三，把农村发展的问题当做科学来研究

你们提出，要使自己的工作服务于八亿农民，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这个想法很好。你们拟定的题目和准备采取的措施，我也赞成。

我想请大家回忆一下恩格斯的一段话。他曾经根据产生空想社会主义的那种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指出它的特征：“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只是弊病；消除这些弊病是思维着的理性的任务。于是就需要发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会制度，并且通过宣传，可能时通过典型示范，把它从外面强加于社会。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愈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愈是要陷入纯粹的空想”。随着历史的前进，生产发展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发展了，社会发展的阶段本身显露出来了，事物之间的内部联系充分表现出来了，历史才给马克思、恩格斯创造了一种条件，就是不需要用一臆想的联系去代替事物之间的客观联系了。新的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做一番新的研究。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就是，适合于早先的经济条件的社会制度已经不再与生产方法和交换形式的变化相适应了，“用来消除已经发现的弊病的手段，这必然以多少发展了的形式存在于已经变化的生产关系本身中，这些手段不应当从头脑中发明出来，而应当通过头脑从生产的现成物质事实中发现出来”。我恳切地希望，你们的研究工作，能够坚持这样一种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

经过三中全会以来两年多的工作，过去在“左”的束缚下被压抑着的正确的东西，得到解放，过去做错了的事情，现在总结了经验，也知道怎么去做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天天讲“社会主义新生事物”那是凭空捏造出来的。林彪、“四人帮”压抑真正的新生事物。这两年，

真正的新生事物显现出巨大的生命力，到处涌现出来。不同的经济条件，不同的气候条件，不同的土壤条件，不同的地区，不同的耕作习惯，不同的行业，都有各式各样的创造。所以我们的研究工作，就是要充分地发现广大农民、广大农村干部在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指引下创造出来的大批新鲜事物，从中总结经验。书是要看的，脑子是要想的，要有思维活动，要有抽象推理，这都没有问题；但基本点一定要建立在发现事物之间的客观联系，发现有生命力的新鲜事物上。

据我知道，你们中间有几个同志，过去一段时间对包产到户做了比较深入的调查。这当然好。但是我劝你们不要只盯在这么一件事情上。一方面，这件事情还要更深入地调查研究；另一方面，一定要放开眼界走遍全中国。当然要有分工，有侧重。要多到一些地方，普遍而深入地了解农民的生活、习惯、思想、感情、愿望。不要以为农民落后就没有创造，不要以为农民穷就安于穷。如果说只有我们这些人才有创造，八亿农民没有创造，那同空想社会主义者就有点差不多了。

外国的经验值得借鉴。毛泽东同志就提倡古今中外进行比较。外国人的情况和观点要了解，但是要从我们的实际出发，有批判地加以吸收。这虽然是老话，但真正要学会运用这个方法。确实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不是靠偷懒能够做到的。你们最近很勤恳，这是很好的。但也不是三年五年、甚至十年八年就能做到的，而且必须一辈子坚持下去，不管什么时候，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坚持下去。不要以为我什么都了解了，什么都掌握了，一定要虚怀若谷。要坚定地相信，富有生命力的东西，永远来自于人民，农村问题方面的富有生命力的东西，必然来自八亿农民。我们是要帮助农民的，我们也负有教育农民的责任，但首先要向他们学习，向他们请教。要把他们的东西加以总结提高，这里头就有我们的用武之地。要勤勤恳恳地把八亿农民创造的东西记录下来。记录下来

以后，加以整理，加以提高。发现事物的客观联系是不容易的。但是只发现还不等于已经成为科学了。发现了，要成为科学，还要上升为规律。这不是人人都能作到的。恩格斯说得好，要善于使用概念，要善于抽象，要善于理解。比如《资本论》，马克思在伦敦博物馆看了很多很多书，其中不少白皮书之类的书。没有那些书，没有那些资料，他写不成《资本论》。可是把那些东西堆在一起，是不是就有了《资本论》呢？那就不是《资本论》，而是白皮书的汇集而已。所以在这点上，我也希望同志们真正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确有创造，确有发明，确有概括，确有提高。

善于思维，善于抽象，两件都不容易，但是，“有志者事竟成”。归根到底，你们是有希望的。说得再乐观一点，在我去见马克思之前，可以看到从你们中间出现一批全心全意为八亿农民服务的农业科学家、农村经济学家。我再活十年吧，像你们这股劲干下去，十年就可以成为有学问的人。

搞一个农业战略规划，已经提上党和国家领导的议程。究竟我们十年内农业应该如何发展？20年后农村将会是个什么样子？要有个长期规划，这个规划一定要科学，要实际，确实能够使我们的八亿农民在几十年内为世界写下一篇光辉灿烂的历史，把我们的农村、我们的农业发展的历史载入史册。实现这一点，我们这样年纪的人也许已经看不到了，但是我们就要开始制定这样一个规划。

中国农村的情况非常复杂，地域很辽阔，各个地区不同，人口又这么多，需要大家努力去找各种办法。你们的调查研究，要适应这个规划制定的需要，紧紧地同规划的制定和实现配合起来。希望你们在这件事情作出自己的努力，贡献自己的才智。